

MAO ZEDONG ZHUO ZUO YU YAN LUN XI

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

主 编 邢福义

副主编 卢卓群 萧国政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国防大学 2 062 4639 2

MAOZEDONG ZHUZUO YUYAN LUNXI

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

主 编 邢福义

副主编 卢卓群 萧国政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

◎ 邢福义 主编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京山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5 插页 375 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701—3 745

ISBN 7-5351-1176-9/II·56

定价: (简精装) 9.45 元

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

撰稿：

白 丁	常 春	陈淑梅	储泽祥	丁 力
冯广艺	郭 萍	李向农	李宇明	刘 斌
刘海章	刘 坚	刘晓宏	刘兴策	卢卓群
屈哨兵	邵则遂	孙松发	谭达人	汪国胜
王群生	吴永德	萧国政	邢福义	易洪川
张东辉	赵 宏	周光庆	周建民	朱承平
朱 磊				

目 录

导论：关于毛泽东著作语言的论析·····	1
毛泽东著作中的句法类化现象·····	17
毛泽东著作中“像”字结构的同形异构现象·····	32
毛泽东著作中的并列分承句法现象·····	47
毛泽东著作中的括入式插说·····	64
毛泽东著作中“为了”“为着”用法考察·····	80
毛泽东著作中的人称指代·····	92
毛泽东著作中的双否定句·····	111
毛泽东著作中的句群组造·····	130
毛泽东著作中是非性反问句的反意形式·····	148
毛泽东著作中是非性反问句的反意类型·····	176
毛泽东著作中的设问句·····	193
毛泽东著作中的特指问句·····	209
毛泽东著作中的选择反复句·····	224
毛泽东著作中的祈使句考察·····	238
毛泽东著作中的同指词语·····	253
毛泽东著作中的反义词·····	266

毛泽东著作中的文言词·····	275
毛泽东著作中的方言现象·····	294
毛泽东著作中的音译外来词·····	311
毛泽东著作中成语连用的语义关系·····	324
毛泽东著作中的成语语用义诠释·····	335
毛泽东著作中的成语异变现象·····	351
毛泽东著作中的谚语·····	368
毛泽东著作中多种多样的释义方式·····	385
毛泽东著作中比喻的结构类型·····	398
毛泽东著作中的排比句·····	421
毛泽东著作中词约义丰的语句·····	435
毛泽东著作中的幽默因素·····	446
毛泽东著作中的比兴论证·····	455
毛泽东著作典故的双重符号性质及其语用风格·····	467
毛泽东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	485
毛泽东语言运用的群众性原则·····	501
后记·····	513

导论：关于毛泽东著作语言的论析

书面语言是一种经过了加工的语言。任何一种书面语言，都有若干代表性作品。就现代汉语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书面语言，无疑是毛泽东著作的语言。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明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家。对毛泽东著作的语言进行研究和论析，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价值。

一 毛泽东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里，此外还散见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工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等文章。

综观毛泽东语言运用的理论，可以鲜明地看到以下三点：

（一）毛泽东强调运用现代的语言，尊重现实中的语种。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在论及“五四”运动时指出：“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选读上，391页）《反对党八股》里又指出：“五四运动时

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选读下，507页）这里的“白话文”是同“文言文”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现代汉语共同语的书面语。这两段论述，肯定了现代汉语共同语作为书面规范用语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民族的语言，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都是现实中存在着和被使用的语言，都应该受到尊重。《论联合政府》一文在论及少数民族问题时指出：“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卷三，1084页）这里，“言语”列为第一位，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列为第二位，这充分反映毛泽东对语言文字运用问题的重视，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双语”“多语”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二）毛泽东强调运用贴近群众的语言，讲求语言运用的群众效应。

“言语必须接近民众”——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选读上，399页）中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从用语人的语言和接受语言信息的群众二者之间的关系说，要使语言接近群众，所用的语言就必须是贴近于群众的语言。

贴近群众的语言，第一个表现是：言之易懂。

毛泽东特别重视言语的通俗易懂。

《反对党八股》中，反复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要求“说群众懂的话”，“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在给《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下的按语中，又对“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的文章大加赞赏，把它当做“写得很好”的文章向各地各单位大力“推荐”。

“懂”的反面，自然是“难懂”。这是毛泽东一贯批评的。《中

国工人发刊词》中，要求报纸的语言切忌“令人看不懂”。《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按语中，又特别对那些“晦涩难懂”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说它们使人感到“头痛”。

贴近群众的语言，又一个表现是：言之有物。

毛泽东特别重视言语内容的“真切”。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某些人：“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反对党八股》中，更是大声疾呼“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第一条罪状，把“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列为第二条罪状，把“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列为第五条罪状，批评说空话，批评不老实，批评“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反对党八股》中还特别指出，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

贴近群众的语言，再一个表现是：言之有味。

毛泽东特别重视言语的“味道”。

《〈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希望这个报纸“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反对党八股》中，把“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列为第四条罪状，说是“面目可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某些作家“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其作品“显得语言无味”。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的按语中，又批评某些人“不讲究文法修辞”，写文章“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

跟语言无味相对立的是语言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毛泽东的主张，可以用《反对党八股》里的一个判断来概括，这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毫无疑问，通俗易懂、真切自然、新鲜活泼的语言，必定是可以收到最佳的群众效应的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告诫大家“写文章做演说……是专为影响人的”，就是要求大家讲究语言运用的群众效应。

（三）毛泽东强调下苦功学习语言，多渠道地学习和丰富语言。

学好语言，是用好语言的前提条件。怎样才能学好语言？

一方面，要下苦功学。这一点，《反对党八股》里说得十分明确而肯定：“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地学。这一点，《反对党八股》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进行阐述。毛泽东指出：“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对这三条的分析，很讲究分寸。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是最基本的，无条件的，而后面两条则分别附加上了“我们所需要的”“有生命的”的修饰语。这三条，不仅是个人学习语言的渠道，而且也是整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丰富和发展的渠道。在这里，毛泽东触及了语言发展的重大课题。

总起来看，毛泽东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既涉及语言系统问题，又涉及语用效应问题，还涉及语言能力问题。具体点说，就是：使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系统，力求取得最佳的语用效应，努力提高语言使用者掌握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如果问：贯穿在毛泽东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中间的根本思想线索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一条关于语言运用的群众性

原则。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已跟卢卓群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并由他执笔写成了《毛泽东语言运用的群众性原则》一文。另外，为了不遗漏地向读者展示毛泽东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刘兴策同志还撰写了《毛泽东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的文章。

二 毛泽东的语言运用实践

毛泽东著作的语言，是毛泽东语言运用理论的具体实践的成品。

下面，从毛泽东的三篇著作中各摘引一段，略加解说。摘引的原则是：第一，内容上有类同性。三段文字都是关于调查研究听取意见的。第二，时间上有代表性。三篇文章，分别写于30年代初期、4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能看到毛泽东运用语言的一贯性。

（一）《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选读上，49页）

这段论说，在总体上用的是庄重严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然而，却有各种渠道的语言因素穿插其间。第一，口语性语言因素。比如开头连用“你……你……你……你……”，指的不只是作为第二人称的一个听话人，而是泛指所有的人。这样活用人称代词

“你”，口语里常常听到。第二，文言性语言因素。比如“冥思苦索”，这是文言用语；“须知……”，这也是文言说法。第三，新兴的语言因素。比如，“他一个人”是名词短语，“邀集一堆人”是动词短语，它们却共同指向后边的“不作调查，而只是……”。这是一种“五四”以后兴起的“成分共用”的句法。此外，这段文字一开头就来一个设问，末尾又通过“换一句话说”造成解证句法，都增强了语言的波澜。

(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选读下，467页)

这段论说，总体上同样是庄重严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然而同样穿插有各种渠道的语言因素。第一，口语性语言因素。比如“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十个有十个要失败”，这是群众口头上常有的说法。第二，文言性语言因素。比如“下车伊

始”，这是文言用语；“须随时”“尤有必要”“至今不悔”“无知妄说”，这是文言味很强的说法。第三，新兴的语言因素。比如，“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共同指向“替我们预备……材料”，这是使用“五四”以后兴起的“成分共用”的句法。此外，“一般地说……特殊地说……”的篇章组造，“所以”“否则”“不但不”“因为”等词语的关系标示，起到了增强论说的严密性的作用。

（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另外有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选读下，821页）

在总体上，这段论说用的仍然是现代汉语的庄重严肃的书面语体。不过，口语性语言因素和文言性语言因素都十分活跃。首先是口语性语言因素。比如“发了火”“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好”“请”等等，都在群众口头上常常可以听到。其次是文言性语言因素。比如“高阳酒徒”，这是文言用语；“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更是文言的说法。此外，恰到好处地来个反问：“不是有

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增强了语言的波澜。特别是，断断续续地出现的富于幽默感的语句，例如“有个知识分子叫酈食其……孔夫子这一派的”，“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更使议论妙趣横生，味道十足。

总而言之，毛泽东运用语言，善于利用来自各种渠道的语言因素，善于充分调动各种语言表达手段。毛泽东著作的语言，是严肃说理的典雅庄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但显得通俗流畅，活泼生动，富于风趣。他的语言运用的实践，贯彻了他的语言运用的主张。

三 毛泽东著作语言的研究价值

研究毛泽东著作的语言，既可以是“修辞问题”的研究，又可以是“语言问题”的研究。“修辞问题”的研究，重在考察语言运用的表达效果；“语言问题”的研究，则涉及有关语言事实的方方面面，包括论析语法、语汇、修辞各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现代汉语来说，毛泽东著作的语言是一个高能广角镜。通过这个高能广角镜，可以发现和探讨许许多多足以深化对现代汉语的理解的重要现象。

以第二部分里提到的“成分共用句法”为例。

如果把成分共用句法的基本构造列成“A₁+A₂→B”这个公式，那么，A₁+A₂可以叫做共指成分，B可以叫做承用成分。

第二部分里提到两个例子：

- [1]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选读上，49页）

[2] 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比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选读下，467页）

“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是A1+A2，“不作调查，而是……”是B；“还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是A1+A2，“替我们预备……”是B。

粗略观察一下毛泽东著作中的语言，就可以发现，光是共指成分A1+A2，就有种种类型。比如：

[3]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卷三，1023页）

[4]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选读下，538页）

这两例，共指成分“能够和必须”“可以而且应该”都是“助动词+助动词”。

[5] 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选读上，361页）

[6] 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卷一，131页）

[7] 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卷三，1056页）

这三例，共指成分“不愿和不能”“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不愿意也不可能”“不会也不应该”都是“助动结构否定式+助动结构否定式”。上面提到的例[2]，其中的“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情况有点类似，但又所有不同：A2“永远不可能”虽然是助动结构否定式，A1“还没有来得及”却是一般的动词结构，尽管它跟助动结构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 [8]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选读下，553—554页）

这一例，“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是两个介词结构状语通过“也”的关联而形成共指成分。

- [9] 这些同志……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选读下，504页）

- [10]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选读上，250页）

上面两例，共指成分“听了或看了”“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都是“述语动词+述语动词”。

- [11] 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卷三，1056页）

- [12] 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选读上，131页）

上面两例，共指成分“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正是，也仅仅是”也出现于述语部分，但从A1到A2是重复动词并增加状语。

- [13] 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选读上，309页）

这一例，共指成分是“党就能，党也才能”，A1和A2都是结构上需要补足的“主语+谓语”。

此外，例[1]的情况又有不同：对承用成分“不作调查，而只是……”来说，共指成分中的A1“他一个人”是主语，A2“邀集一堆人”却是个属于动词短语的动宾结构，只有其中的“一堆人”跟承用成分之间可能存在主谓关系。

成分共用句法可以增强语言表达的经济凝炼。这种句法进入

现代汉语书面语，并且得到发展，跟“五四”以后翻译外语作品有关。从上面所举的十来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著作中出现的成分共用句法现象是丰富多彩的。那么，这种成分共用句法和一般的语词并列句法在语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这种句法在语里意义上有什么特点？共指成分有哪些类型？承用成分有哪些情况？共指成分和承用成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些问题，如果透过毛泽东著作语言这个“点”来观察现代汉语书面语整个“面”，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再以“和”“同”二词的用法为例。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最后几篇文章写作前后的那段时间，语法学界有过一个结论性的说法，这就是：“和”“同”已有明确的分工，“和”用作连词，“同”用作介词。

的确，“和”“同”是有分工，这能增强语言的表意能力大有好处。但是，它们的分工是否就是连词和介词的明确分工？

以“和”来说，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在不跟“同”同时出现时，这个词可以是连词，也可以是介词。例如：

[14] 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卷五，195页）

这里有两个“和”。前一个“和”是连词，“速度和质量”是并列结构；后一个“和”是介词，“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是介词结构，出现在“都能够”的后边。

以“同”来说，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在不跟“和”同时出现时，这个词固然通常用作介词，但有时也可以是连词。例如：

[15] 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卷五，416页）